

韓昌黎之原性與原道先後論

王能傑

一、前言

韓愈，自宋蘇東坡稱之為「文起八代之衰，道濟天下之溺」以來，其文固如蘇洵所謂「如長江大河，渾浩流轉，魚鼈蛟龍，萬怪惶惑，而抑遏蔽掩，不使自露，而人望其淵然之光，蒼然之色，亦自畏避，不敢迫視。」明人茅坤稱之為「吞吐聘頰，若千里之駒，而走赤電，鞭疾風，常者山立，怪者霆擊，韓愈之文也。」而列韓愈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首。其文以載道之主張，宋人歐陽修謂「有道而能文者，莫若韓愈。」清人沈德潛謂「唐代文章，惟韓愈能近道。」方東樹亦謂「修業明道，語關世教，言言有物。」為後人所尊崇。

而若干道學深入者則頗不以為然。如張耒謂「韓退之，以為文人則有餘，以為知道則不足。」宋儒陸九淵則謂韓愈為唐代「文章宗伯」，然亦謂之為「因學文而學道」、「是倒做」了。清人廖燕指陳昌黎「見道未徹」，謂其「原道、原性諸篇，膚淺已甚。」諸說云云，皆未中肯。古今以來能獨具慧眼，判原性與原道為不同時期之作品者，厥為宋儒程頤。

二、程頤之論斷

宋儒程頤謂：

「退之晚來為文，所得處甚多。學本是修德，有德然後有言。退之卻倒學了。因學文日求所未至，遂有所得。如曰『軻之死，不得其傳』，似此言語，非是蹈襲前人，又非鑿空撰得出，必有所見，若無所見，不知言所傳者何事？」

（原性等文皆少時作）（二程語錄卷十一）

程子以原性為少時所作，而原道為晚年之作，實為千古不易之論斷。

後人如宋呂大防列原道、原性等五原之作為同時作品皆未能深入昌黎思想之轉變。近人如莊適等人，亦認同此說，實則原性與原道之思想距離頗大。何則？一言以蔽之曰：原道尊孟，而原性未之見也。顯然原道為韓昌黎道統說思想成熟之後，始克有之。

三、韓愈作原性之因緣

隋唐為佛教之極盛時代，開有大小乘達十三宗之多。其中天台、華嚴、禪宗、淨土與真言宗等影響後世頗大。天台宗之五重玄義與華嚴宗之十玄門又為各宗解經之必然途徑。天台宗止觀之理，自智者大師發揚光大之後，雖曾沈寂一時，其後復

有荆溪大師再予以發揚。其門弟子梁肅爲中唐時之文章大家，亦曾司貢與。曾於貞元二年祖述止觀之理而作止觀統例一卷。李翱，字習之，貞元九年初謁梁氏（見拙作李習之研究），彼時尚未知曉梁氏爲知己，其後每試於禮部，輒遭罷黜，始痛念知己之難遇，而梁君此時已故，因而作感知己賦以爲追念。其後復性書三篇即依梁氏止觀統例之綱目而發揮性命之大道。考復性書作於貞元十七年，習之融止觀之理於中庸誠明之道，不著痕跡，影響後世極爲深遠，周濂溪之論誠，即依復性書之論誠，而以「寂然不動」釋之，爲宋儒所宗，亦爲識道者所知賞。宋葉夢得謂之曰：

裴休，得道於黃蘗圓覺經等諸序文，皆深入佛理，雖爲佛者亦假其言以行。而吾儒不道，以其爲言者佛也。李翱復性書，即佛氏所常言，而一以吾儒之說文之。晚見藥山，疑有冥契，而爲佛者不道，以其爲言者儒也。此道豈有二，以儒言之則爲儒，以佛言之則爲佛。而士大夫每患不能自求，其所聞必取之佛，故不可行於天下，所以紛然交相詆，卒莫了脫其實也。韓退之答孟簡書，論大顛以爲實能外形骸，以理自勝，不爲事物侵亂，胸中無隔礙。果爾，安得更別有佛法？是自在其說中而不悟。退之原性，不逮李翱遠甚。蓋別而爲二，必有知者然後信之。李翱作復性書時年二十九，猶未見藥山也。然求於吾儒者，皆與當時佛者之言無二，故自言志於道者四年，則其學之久矣。然無一言近佛，而猶微外之與老莊並列。蓋以世方力詆其說，不可與之爭，亦不必爭故爾。吾謂唐人善學佛，而能不失其爲儒者無如翱。若王縉、杜鴻漸以宰相傾心爲佛事，蓋本於因果報應之說，猶有意微倖以求福，乃其流之下。概而王摩詰、白樂天爲佛則可矣，而非儒也，是召干戈而求不鬥，雖欲使退之不作可乎？孟簡反欲乘其間而屈之，亦陋矣。復性書上篇，儒與佛者之常言也；其中篇，以齋戒其心爲未離乎靜，知本無有思，則動靜皆離。視聽昭昭不起於聞見，而其心寂然，光照天地。此吾儒所未嘗言，非自佛發之乎？末篇，論鳥獸蟲魚之類，謂受形一氣，一爲物一爲人，得之甚難，生乎世，又非深長之年，使人知年非深長而身爲難得，則今釋氏所謂人身難得，無常迅速之二言也。翱言之何傷？而必欲操釋語以誨人！宜其從之者，既不自覺；而詆之者，亦不悟其學之所同也。」

（避暑錄話卷下）

李翱既於貞元十七年融天台止觀之理於中庸誠明之道而作復性書，韓昌黎必當耳聞目睹。蓋李翱自貞元十二年初識韓愈於汴州，既而學古文於韓愈，復薦韓愈於徐州節度使張建封。貞元十六年，取韓愈亡兄之女爲妻，而主媒者亦爲韓愈（詳見拙作李習之研究）。故貞元十七年，李翱之復性書出，韓昌黎必當知之，亦當知其思想之淵源所自。以故韓氏以儒者之正統自居，必深惡於所謂異端，應予口誅筆伐。復又投鼠忌器，因復性書之作者，乃爲其姪婿，關係密切，非比尋常。且李翱尚無尊昌黎爲師之意，如何而可明言非之？清人全祖望於韓李關係論之頗詳。曰：

習之之學，未嘗盡本於退之。或者不察，竟以爲韓門籍、湜之流。蓋退之實欲致之於門下，特習之不屈耳。習之之妻，退之兄子也，然其呼退之爲兄，則尙

不肯以後輩之禮自居，而況師之云乎！」（鮚埼亭集外集卷三十七）

如此難處之勢，昌黎原性之作，蓋有所爲而言者也。習之以性靜情動，動靜皆離，寂然不動爲言，昌黎原性則亦言性情之云云。且文末曰：

曰：今之言性者異於此，何也？曰：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者，奚言而不異！其或指李翱之復性書，殆無疑異。宋人范浚曰：

昔李翱在唐諸儒中言道最純。然其用心勤甚，而時人莫之知，後世亦莫之知，翱從韓愈爲文章，辭采雖下愈，而議論渾厚。如復性書三篇，貫穿群經，根極理要，發明聖人微旨良多，疑愈所不逮，而愈但稱翱學文頗有得耳。翱亦自謂與人言，未有是我者，是當時莫之知也。近世名儒尙論古人衆矣，曾無以言道與翱者，至或指復性書爲中庸義疏，而曰愚者雖讀此不曉也，不作可焉。是後世亦莫之知也。」（香溪集卷十八答徐提幹書）

蓋習之作復性書之時，未獲同調，僅於南觀濤江之際，得有陸儻之相與，其間想亦論之於退之之前，當無可疑，其不獲許也自不待言。以故韓子原性之作，蓋有激於習之復性書之作也。

夫子之言性，僅謂之「性相近也，習相遠也。」至孟子始言性之爲善，荀子則隆禮而言性之爲惡。揚雄則折中孟荀之言而謂性爲善惡混。曰：人之性也善惡混，修其善則爲善人，修其惡則爲惡人。氣也者所以適善惡之馬也與。（法言修身卷第三）

自張籍比退之爲當代之孟軻、揚雄，乃至於比之爲顏子。退之雖未立即著論闢佛，以其好名之個性（按：伊川指退之正在好名中，見二程語錄卷十一），必沾沾自喜，隱隱以當代之孟軻、揚雄自比也。其尊孟抑荀揚之思想，必至晚年乃臻成熟，故原性之作乃融孟、荀、揚三家論性之旨，雖未有建樹，然以昌黎之博學高才，文氣之盛，雖其義理未甚能契於道，而後人推尊者，亦復不少。

世傳韓氏五原之作，乃其所獻於兵部李侍郎書者也，而謂五原爲同一時期之作品。如清蔡鏞曰：

按：韓集有五原篇：原道、原性、原毀、原人、原鬼。當是同時之作。其與兵部侍郎書所謂舊文一卷，扶樹教道，有所明白者，疑即此諸篇也。（蔡氏古文評註補正全集卷六）

持此見解者，不一而足，其餘不論矣！細考原道與原性之作，其思想背景則不可同日而語也。原道尊孟而抑荀揚，原性則孟、荀、揚三家皆尊而取之，並無軒輊。故程伊川以原性爲少時所作，而原道爲晚年之作，乃爲不易之論也。朱子亦謂：「與兵部李侍郎書所謂『舊文一卷，扶樹教道，有所明白』者，疑即此諸篇也。」劉海峰且謂：「公上李侍郎書謂舊文，扶樹教道，有所明白，蓋謂此等。」（古文辭類纂韓愈原性之後評）而上兵部李侍郎書，則作於永貞元年十二月九日，永貞元年即貞元二十一年。以故原性之作，當不早於貞元十七年，亦不晚於貞元二十一年，其或作於貞元十八年、十九年或二十年，彼時韓愈約三十五歲上下，故程伊川以少年

稱之也。

原性之作，僅以孟子之性善、荀子之性惡及揚子之性善惡混三家學說，融爲一說，並無新意，而自詡曰：

三子之言性也，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，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。

如是而論，則孟、荀、揚之論性，皆有所不足。其實原性未有已見，茅鹿門評之曰：

性之旨，孟氏沒而周程始能言之，昌黎原不見得，特按三家之言而剖析之如此，然於天命之原，已隔一二層矣！（王文濡校古文辭類纂引語）

茅氏之評，頗中肯綮也。

綜上所述，可知韓愈原性之作，蓋出之於鍼砭李翱復性書而作也。其以孟荀揚三家之言融爲一說，而自居爲儒門性論之正統，以別於李氏之雜佛老而言者也。亦知李翱之叛去，宋人陳善曰：

李翱親從韓退之遊，而學佛自若也。今之讀韓文者，則皆闢佛者，然公自言籍、滉輩屢叛其教，而獨不及翱，此又何也？（捫虱新話卷三 李翱學佛）

此爲後人未詳李翱之師承遠自天台宗之止觀者也。是後韓門弟子皇甫湜作孟子荀子言性論，其中心思想亦承自韓愈之原性。未許孟子之言，亦未許荀子之論。指孟子爲舉本而推末，所以道性善。指荀子爲自葉而流根，所以道性惡。及乎杜牧作三子言性辨，依三子而言七情，其大意仍不出韓愈之原性及皇甫湜之孟子荀子言性論之範疇。及至有宋一代，其爲性論紛然，莫衷一是，今不論。而後人以尊韓之文，亦尊韓之原性，蓋未之思也。程伊川謂之曰：「揚雄韓愈說性，正說著才也。」（二程語錄卷十二）世以周程之論性，不及退之，以爲不公，乃其勢利與！

四、原道之成篇年代

貞元十五年，張籍力勸韓愈著論闢佛，謂昌黎「執事聰明，文章與孟軻揚雄相若，盍爲一書，以興存聖人之道，使時之人，後之人，知其去絕異學之所爲乎？」而昌黎答以「請待五六十然後爲之」又曰：「俟五六十爲未失也」。故昌黎至五十四歲，貶潮還朝之後，一則思想逐漸成熟，一則年齡已老大，正爲下筆著論闢佛之時也。黃庭堅曰：

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，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，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。（豫章黃先生文集卷十九與王觀復書三首）

考原性之作於韓愈三十五歲時，至元和十五年，韓愈五十三歲，作與孟尚書書，雖爲書信體，而實則爲闢佛之書，此乃接續諫佛骨表後之闢佛文章，然其思想已與諫佛骨表專由福田利益爲言大不相類，可視爲原道之前響，其文曰：

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，其亦有說。孟子云：「今天下不之楊，則之墨。」楊墨交亂。而聖賢之道不明，則三綱淪而九法斁，禮樂崩而夷狄橫，幾何其不爲禽獸也！故曰：「能言拒楊墨者，皆聖人之徒也。」揚子雲云：「古者楊墨塞路，孟子辭而闢之，廓如也。」夫楊墨行，正道廢，且將數百年，以至於秦，

卒滅先王之法，燒除其經，坑殺學士，天下遂大亂。及秦滅，漢興且百年，尙未知脩明先王之道，其后始除挾書之律，稍求亡書，招學士；經雖少得，尙皆殘缺，十亡二三，故學士多老死，新者不見全經，不能盡知先王之事，各以所見爲守，分離乖隔，不合不公，二帝三王群聖人之道，於是大壞。後之學者，無所尋逐，以至於今泯泯也，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。孟子雖賢聖，不得位，空言無施，雖切何補；然賴其言，而今學者尙知宗孔氏，崇仁義，貴王賤霸而已；其大經大法，皆亡滅而不救，壞爛而不收，所謂存十一於千百，安在其能廓如也！然尙無孟氏，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。故愈嘗推尊孟氏，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。漢氏已來，群儒區區修補，百孔千瘡，隨亂隨失，其危如一髮引千鈞，綿綿延延，寢以微滅，於是時也，而唱釋老於其間，鼓天下之衆而從之，嗚呼！其亦不仁甚矣！釋老之害，過於楊墨，韓愈之賢，不及孟子，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，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。嗚呼！其亦不量其力，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！雖然，使其道由愈粗傳，雖滅死，萬萬無恨，天地鬼神，臨之在上，質之在傍，又安得因一摧折，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！籍湜輩雖屢指教，不知果能不叛去否？……

此書可視爲原道之雛形。其以楊墨喻佛老，而推尊孟氏，以爲功不在禹下。且又謂：「釋老之害，過於楊墨，韓愈之賢，不及孟子，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，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。」比之當年答張籍書之直稱孟軻，已較爲恭敬，且已隱隱自比爲當代孟子之意矣！此爲日後原道之中心思想。又曰：「使其道由愈粗傳。」則道統之觀念已逐漸形成，爲日後原道道統說之根源。總之，原道之思想與孟尙書書之思想，已大致若合符節，謂之爲原道之前響，實不爲過。

追究昌黎思想之轉變而日趨成熟，除歲月之移易，有以致之，其貶潮而見大顛，不能不受薰染，而晚年之讀荀子及揚子之書，或有得焉。其送王秀才序曰：「孟軻師子思，子思之學，蓋出曾子；自孔子沒，群弟子莫不有書，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，故吾少而樂觀焉。……夫沿河而下，苟不止，雖有遲疾，必至於海，如不得其道也，雖疾不止，終莫幸而至焉，故學者必慎其所道，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，而欲之聖人之道，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。故求觀聖人之道，必自孟子始。」其推尊孟子，與原道之意相若。其讀荀子一文，殆爲晚年之作，文曰：

始吾讀孟軻書，然後知孔子之道尊，聖人之道易行，王易王、霸易霸也，以爲孔子之徒沒，尊聖人者，孟氏而已。晚得揚雄書，益尊信孟氏，因雄書而孟氏益尊，則雄者，亦聖人之徒歟！聖人之道，不傳於世，周之衰，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，紛紛藉藉相亂，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，然老師大儒猶在，火於秦，黃老於漢，其存而醇者，孟軻氏而止耳，揚雄氏而止耳。及得荀氏書，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，考其辭，時若不粹，要其歸，與孔子異者鮮矣；抑猶在軻雄之間乎！……孟氏、醇乎醇者也，荀與揚，大醇而小疵。

此文，韓昌黎之於孟子乃「少而樂觀焉」，及乎晚年，自謂「晚得揚雄書，益尊信孟氏」，可知其尊孟思想至乎晚年始臻成熟。「及得荀氏書」，考其辭，要其歸，猶知其在軻雄之間乎！於是確認「孟氏，醇乎醇者也，荀與揚，大醇而小疵。」此為原道「軻之死，不得其傳焉，荀與揚也，擇焉而不精，語焉而不詳」之張本，即其尊孟而抑荀揚之思想來源。且其「火於秦，黃老於漢」之言又為原道之「問道衰，孔子沒，火於秦，黃老於漢，佛於晉魏梁隋之間」之芻議。清人何焯評重答張籍書曰：

其原出于孟子。此書初識張籍時，時年三十許耳。此時盛尊揚雄，其後謂其「大醇小疵」，則退之之學進矣。末年乃謂「軻之死，不得其傳」，及答孟簡書中，不數況雄諸子，又一詣也。（義門讀書記昌黎集第二卷評語）

何義門所謂之「大醇小疵」者，讀荀之謂也。「軻之死，不得其傳」者，原道之謂也。論斷原道為昌黎末年之作，所見甚是。

以是考之，原道作於何年乎？韓昌黎於元和十四年貶潮州，旋改袁州。十五年，穆宗立，召拜國子祭酒。長慶元年，轉兵部侍郎。二年，調吏部侍郎。三年，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，仍改吏部侍郎。四年八月，以病免，十二月，卒於長安。享年五十七。追贈禮部尚書，諡文。則原道應作於長慶元年至四年之間。以其年事已過五十，且思想成熟，而官位亦盛之故也。較之於答張籍書時之自謂年少位卑者不可同日而語也。故原道作於長慶年間，殆無疑義。而原道之影響於後世者，厥為尊孟與道統說之建立，其影響於後世亦頗深遠，今不論。